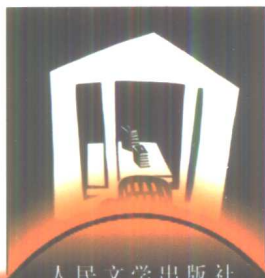


陈维昭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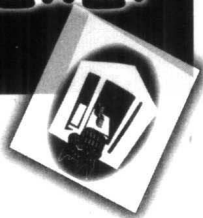
红学与 二十世纪 学术思想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红学与 二十世纪 学术思想

陈维昭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陈维昭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

(畅谷文丛)

ISBN 7-02-002954-X

I. 红… II. 陈… III. 红楼梦研究-文学思想史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8326 号

责任编辑:张福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0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5.00 元

编辑人语

我们有许多文化泰山可供仰止，我们有许多成熟的学术和学术的成熟。可我们还有一种期盼——期盼一次撞击和一次超越。

因了破壁的期待，多年的面壁才成为甘愿的付出。因了穷经的追逐，继晷的膏油才会被不停歇地点燃。因了共有的执着，“旴谷文丛”才得以实现实力的主题。

也许，尝试会迷失在尘封的历史里；也许，探索会导向一个错误的轨迹。但每一次的尝试或探索都会在文化的苦旅里作出自己的贡献——用失败为后人树立一个正确的坐标。

这套书的作者全是中青年学者，他们不是用名声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实力，他们只是用一种努力来不负一次相约——用你我的手，托起一轮明日的学术太阳。

《淮南子·天文训》云：“日出于旴谷。”“旴谷文丛”之名由此而来。

FL 100 / 115

序

黄 天 骥

去年,我到汕头大学访问,陈维昭同学告诉我,他所著的《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一书,即将问世,嘱为之序。我看到他那份很有分量的劳作,知道他经过辛勤的耕耘又有了新的收获。灯前展卷,遂欣然命笔。

八十年代初,维昭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求学,本科毕业后,又攻读硕士学位,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毕业离校。那一段,系里的学习风气很好,许多同学能够刻苦地、自觉地、创造性地学习。记得当年维昭随我一起研读元明清戏曲文学,我因兼着中文系和研究生院的行政工作,终日忙忙碌碌,真正能坐下来和维昭切磋学问的机会也并不多。好在研究生的学习,主要是靠自己。三年过去,维昭学习成绩斐然。他撰写的毕业论文,有不少独创性见解,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维昭毕业后到华南师大从事教学工作,后来又返回汕头市,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出力。1990年初,维昭到康乐园探访我,彼此话虽不多,但心情互通,意气相投,师生间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上午,我觉他比求学时长高了,也显得更加成熟了。当我知道他在行政工作之余,执着地从事学术研究时,很是高兴。以我看,在高等学校,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应该多作



研究，加强科研能力。当教师者，自不待言；当干部者，如果不在学术的河流中游泳，或者不擅于总结与教育有关的各种问题，也就不懂得高校工作的规律，不理解教师工作的甘苦，不可能立足本职为教学工作服务。近几年，维昭锲而不舍地钻研学术，他既在实际工作中更深刻地领悟了人生，又在提高了洞察能力的基础上观照学术，因而能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把行政事务和学术研究同时做好。

维昭近年关注古典小说研究的问题。经过潜心研索，他写成了这本书，为研究红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我国，《红楼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纵观我国的文学作品，没有哪一部能像《红楼梦》那样，问世以后，便长时期地掀起一阵阵波澜。且不说研究其名物、作者，评析其旨趣、技巧的论著，多如汗牛充栋，更有意思的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环绕着《红楼梦》的学术研究，往往成了观察社会思潮的窗口，甚至成了社会变动的晴雨表。因此，研究《红楼梦》的研究历程，弄清楚《红楼梦》研究的各种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维昭在他的论著中，把索隐派、胡适的实验主义以及解放后社会政治批判的做法，都作了详细的剖析，并且系统地探讨了学者们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对《红楼梦》作审美的诠释。由此切入，进一步透视《红楼梦》研究各种主要方法的文化依据，希望能在宽广的文化背景中审视《红楼梦》研究的底蕴。这就不是单线平涂式的研究《红学》。我想，维昭的做法，有助于人们了解《红学》研究的本质。

我对《红楼梦》素乏研究，只写过几篇有关它的题旨、形象之类粗浅的文章。但是，即使像我那样与《红楼梦》结缘不



深的人，也会被《红楼梦》研究问题所引发的风浪，触动灵魂，辗转反侧。使我一直困惑的是，近百年来，为什么凡是与学术研究沾上边者，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红潮的牵扯。我曾想，这是否和中国知识分子心头上有一个解不开的政治情结有关。不过，仔细忖度，仅仅看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依然是浮面的，依然没有触及心态中深层次的问题。现在，维昭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把《红楼梦》的研究史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学术史、思想史等文化诸元联系起来，甚至还考虑到东西方文化思潮的呼应与撞击，这显然更能说明隐藏在红学研究背后的真谛，也更能解释为什么学术界总会与红学研究的思想，在震幅中同步起伏的原因。

从我国的历史看，宋明等代，曾发生过多起的“学案”。宋儒、明儒乃至清儒们在思想上的交锋，既推动了我国学术的发展，也反映出我国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我想，维昭所综论的《红楼梦》研究学术史，换一个角度来说，不也是一桩儿经论弁百年不辍的“学案”么？剖析这桩“学案”的每个阶段，把百多年形形色色的思想交锋连缀起来，从其蜿蜒曲折的律动看文化的承传、扬弃，从其变化腾挪的态势看中国社会的进程、轨迹，不是很能发人深省么？现在，维昭这部著作，所涵盖的不仅仅是一本书的问题，他要让读者看得更广，想得更远。他的尝试，相信会得到人们的赞许。

维昭离开母校将近十年了，这段期间，风云变化，特别是经济大潮，滔滔汨汨。汕头在海之滨，潮汐对人们心灵的冲擦、振荡，比起其它地方，想必会更直接更激烈的吧！但是，维昭只一心钻研学问，在灯红酒绿的市廛中甘坐冷板凳，这是需要有献身于学术的坚忍意志的。尝闻大隐隐于市，维昭当然不是什么“市



隐”，但就甘于淡泊这一点而言，倒真有点隐忍的功夫。维昭一向好学深思，加上有着追求学术追求真理的挚诚，我相信假以时日，他是一定能作出更多的成绩的。

1997年5月4日于中山大学

目 次

绪言	1
第一章 索隐方法与经纬学术传统	9
一 索隐与道咸时期的今文经学复兴	9
二 索隐、影射与诗骚学术传统	13
三 《红楼梦》·脂砚斋·经学旨趣	24
四 《红楼梦》的命运图式	37
五 影射·谥号命名法·“六书”	45
六 索隐——视界的拓展与融合	52
第二章 《红楼梦》考证与科学方法	60
一 胡适与朴学、实验主义哲学	60
二 归纳与演绎	69
三 考证方法与文学方法	93
第三章 社会——文化的诠释维度	108
一 社会政治批判	109
二 阶级批判	116
三 文艺社会学研究	132
四 文化(文物典章制度)研究	141
第四章 审美之维	147



一 现实主义美学诠释	147
1. 客观性与典型化	148
2.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	162
3. 阶级性与人性	169
二 悲剧与历史的统一	180
三 主题多义性与接受美学	192
1. 创作倾向与本旨还原	192
2. 接受美学	198
四 科学主义复兴与《红楼梦》叙事美学	211
第五章 主体价值学诠释	224
一 主体性哲学与价值学诠释	224
二 性爱与圣爱	235
三 大观园：乌托邦？	245
四 悲剧的主体价值体验	260
1. 悲剧超越	260
2. 悲剧的消解	266
五 审美直观与伦理学维度	273

绪 言

自从索隐派红学诞生以来,《红楼梦》的文化意义越来越引人注目。至今,它的文化意义和艺术成就已经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得到承认。不管是出于“从……看《红楼梦》”的目的,还是出于“从《红楼梦》看……”的目的,《红楼梦》的符号性越来越显示其巨大的诠释功能,越来越显示出对于各种对话的构成功能。鲁迅先生说:自从《红楼梦》诞生以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肯定了《红楼梦》在中国思想史、美学史、文学史、小说史上的划时代意义。《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而传统的评点方法、题咏方法、索隐方法、考据方法,西方传入的小说批评方法、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价值学方法,也纷纷把《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中最有效的诠释、研究对象。近、现代以来的很多中国思想家、美学家已把对《红楼梦》诠释作为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科学家也把《红楼梦》作为其实证方法、逻辑方法的研究对象。一些文学家也通过诠释《红楼梦》而表达其文艺观点,刘心武先生涉及了一些《红楼梦》的考证问题之后,创作了小说《秦可卿之死》,并创造了“学术小说”的概念;王蒙先生在撰写了专著《红楼启示录》和评点了《红楼梦》之后,已被冯其庸先生称为“红学家”。《红楼梦》研究实际上已与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史、哲学史、思想



史、美学史、学术史的发展相呼应。

本书选择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作为切入的角度，去透视《红楼梦》研究史上的各种主要方法的文化依据。

《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是模糊而又神秘的。它由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成八十回，据说又由高鹗续写而成一百二十回。它前后有过五个书名，它的故事的前身的作者另有其人。它的故事有曹雪芹的影子，也有“原始作者”的影子。它的任何“旧稿”至今未获一睹，而“旧稿”的蛛丝马迹却现身在《红楼梦》里。这是《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其他章回小说的不同之处。三国故事、水浒故事、西游故事的演变过程大体上都有迹可寻。唯独《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如此扑朔迷离。而这个扑朔迷离的成书过程却由伴随、参与《红楼梦》的创作过程的脂砚斋、畸笏叟等人以神秘的方式提示、暗示出来。脂评蕴含着传统的史学、经学旨趣。索隐派红学和考证派红学循着脂评的提示、暗示进行一番还原归真的工作。索隐方法、考证方法的运用，既是对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也与乾嘉以来的学术思潮共脉搏。

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到清代道光年间，出现了今文经学的复兴。这种复兴是对乾嘉考据学的反动。本来，清代的考据学是对晚明以来的空疏学风的反动。晚明以来，徐光启和复社文人出于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提出经世致用思想，猛烈抨击当时的空疏学风，提倡实学。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在总结明朝衰亡的原因时，把明朝的衰亡归因于朝政的腐败，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则归因于在当时占思想主流的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学风。以经学取代理学，是清代思想史的一条主线。从明末清初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到乾嘉的回归汉学，再到道咸至清末的今文经学，前后相承。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采取实证的方式，这是清



初学者重要的学术思想。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这样，回归经学就必须经由考据学、小学的途径去完成。要经世，首先就必须通经；要通经则首先必须考订经书的文字意义。

然而，到了乾嘉时期，由于政治的原因，经世致用思想逐渐让位于考据学。尤其是到了道咸时期，考据走向繁琐。当时的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落，走向它的末世，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变革逼在眉睫。龚自珍、魏源应运而生，他们提出了改革变法的思想。而“托古改制”、通过重新诠释传统经典以表达新的思想，这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龚自珍、魏源继承今文经学，通过诠释传统经典的微言大义去抨击时政，提倡变革。

经世致用，学以致用，“史以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条重要思想，它导致了忧患意识、文以载道、文艺干预生活、文艺为政治服务等文艺思想。索隐派红学承接了这一传统。

乾嘉考据学的注重证据、提倡怀疑的学术思想对于明代以来与政治强权相表里的在思想领域处于独尊专制地位的理学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然而，作为一种治学方法，考据学则是任何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所共同运用的。胡适先生因为提倡科学精神，提倡重估一切价值，强调实验的标准作用，发动了一场整理国故运动。考证方法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方法。然而，考证工作、考证方法却不是哪一个时期、哪一个学科所独专的。作为一种方法，它贯穿了几千年中国学术史。胡适之后的《红楼梦》考证，已成为红学中重要的学术分支。

自十九世纪末，尤其是二十世纪初，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涌进了中国。这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新时代。叔本华、尼采、黑格尔、达尔文、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杜威等



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纷纷传入中国的大门。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即使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学者,也在通过直接或间接表达某一西方思想而表达自己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和解释。表面看来,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界似乎是各种西方思想进行接力赛的竞技场。

在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文化界与西方文化接轨的现象十分引人注目,各种西方文化思想如七彩万花筒一下子展现在中国的文化界,令人眼花缭乱。对西方文化思想的介绍、褒扬、引用乃至依样画葫芦等成为一种时尚,西方文化思想曾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界价值取向的重要参照物。短短的几年或十几年,就把西方 18 世纪以来的重要思想过滤了一遍。在这两个时期,中国的很多文化人对于西方文化思想都曾到了推崇备至、溢美而至于忘情的地步,“全盘西化”曾经成为当时振聋发聩的时代呼声。

然而,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界与世界文化的横向联系的过程中,在“全盘西化”的主观努力过程中,中国文化界与传统文化的纵的联系始终成为中国文化界的理解、解释、应用活动的先在结构,一方面,“全盘西化”的口号与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意识相关,另一方面,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是以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判断为依据去选择西方思想的,任何一种西方思想在进入中国大门的过程中已被中国化了。这是与传统文化的双重联系。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界是依据自己对现实境遇与前途命运的理解去选择、翻译、强调和运用不同的哲学思想或一种哲学思想的不同方面。于是,西方的几乎所有的重要哲学思想在中国文化界经历了它们在西方文化界的相同命运:一个时代的不同学者、不同时代的学者都



在选择、强调这些西方重要哲学思想的不同方面。二十世纪初，王国维眼看着封建王朝土崩瓦解、前途渺茫，他借助于文字去表达他的悲观厌世情怀，他选择了《红楼梦》，选择了叔本华，因为《红楼梦》后四十回最具悲观厌世精神，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更给他本体论上和人生观上的支持。他在《红楼梦》和叔本华哲学中找到借物言志的对象。在这种表述中，佛学思想、庄子的虚无主义思想与叔本华哲学合流了（当然，叔本华哲学和《红楼梦》本身已是对佛学的厌世思想的演绎）。

胡适留美归国后，在批判传统文化、提倡科学精神的时代洪流中，他提倡整理国故运动，提倡西方的科学精神，而考证方法则又成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考据学的交汇点，《红楼梦》考证成为他的客观方法的实验场所。他的《红楼梦》考证是以批判索隐派红学为起点的。从方法论上看，如果说，索隐派红学运用的是传统解经方法中的演绎方法，从文本的个别词句演绎出其背后的微言大义，那么，胡适的考证方法运用的则是传统考据学（尤其是清代朴学）的归纳方法，从尽可能多的材料、例证上归纳出某种一贯性。在归纳方法上，传统考据学与西方的归纳法相通。而在反思批判传统文化的时代思潮中，在怀疑、否定权威（尤其是传统的权威）、提倡独立思考，强调实践的标准作用的时代精神中，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一根有力的杠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反专制、倡民主、倡自由的旗帜之下，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文学作品都被安置在这一旗帜之下。人们从社会制度、婚姻制度、爱情关系对于反封建、反专制的意义等社会学维度去诠释《红楼梦》里那些社会批判的描写。在当时那种“文艺为政治服务”、“文以载道”等文艺观念的指导下，当时对《红楼梦》所作的社会政治层面的诠释显然有机械的、



简单比附的毛病。这些诠释举出民主、自由、反专制、反封建的旗号,这些旗号是在西方文化那里接过来的。这种所谓的社会学诠释与索隐派红学的方法渊源于同一文化传统,这就是“文以载道”的文艺观念和索解微言大义的演绎方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已有学者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社会学进行批评,但这种批评、反思并没有被介绍到中国来,这不是因为这种批评在当时的苏联不引人注目,而是这种批评不符合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国情。在强调反封建、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古典作品的社会批判被诠释为阶级批判。这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滥用造成了这样一个理论上的困难,即封建贵族阶级的作家为什么要对本阶级进行阶级批判,宣告本阶级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于是就诞生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的命题。在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文艺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这种把古人现代化的做法是自然而然的事。

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现实主义美学诠释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思想,强调在社会关系中,尤其是在阶级关系中,以人的经济地位物质利益关系为人物行动的内在依据,对社会生活进行反映,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真实。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末以至八十年代,出于对决定论的否定,出于对四人帮时期的专制、否定个人价值与权利、否定个人欲望与感情的暴行的厌恶与痛恨,人性、感性、个体、主体性的觉醒成为那个时代最为引人注目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异化(它被理解为物质世界对于作为感性个体的异化现象)的思想,关于人的感性活动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的思想被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强调,以至于片面地强调。主体性哲学、美学是这个时代重要的哲学、



美学思潮。探讨《红楼梦》的存在论价值的论著纷纷问世,出现了刘小枫关于《红楼梦》价值现象学诠释的论著^[2]、成穷关于《红楼梦》的主体超越价值的诠释^[3]。

作为对专制政治、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做法的另一种反拨,七十年代末以至八十年代初,出现了把美抽象化的倾向,《红楼梦》被理解为“对美的毁灭的悼念”,而这个“美”是具有人性的普遍适应性的。从对“阶级斗争主题”的厌恶转为对主题多义性、性格多面性的推崇,再到了强调各种个体化理解的合理性的接受美学,都可以视为这种反拨心理的产物。

海外学者夏志清、宋淇、余英时诸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也是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在《红楼梦》研究上交汇的产物,宋淇、余英时在大观园的理想性的强调,与他们对政治决定论的否定、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拒斥、对作家主体性的强调相关。他们以桃花源、乌托邦去附会大观园。

总之,二十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史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是同步的,与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思潮是互相呼应的。出现在二十世纪《红楼梦》研究史中的学术思想、方法乃是当时的文化界、学术界所提供的,而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界、学术界的很多理论灵感表面看来是在西方文化那里获得的,实质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中国民族命运是其获取灵感的内在依据。出现在二十世纪《红楼梦》研究中的学术思想、方法,乃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依据现实的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对西方文化进行中国化而获得的。正因为《红楼梦》研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关系如此息息相关,使得《红楼梦》研究的“边界性”现象非常引人注目,以致有人要探讨红学究竟是小说学、文艺学,还是考据学、历史学。